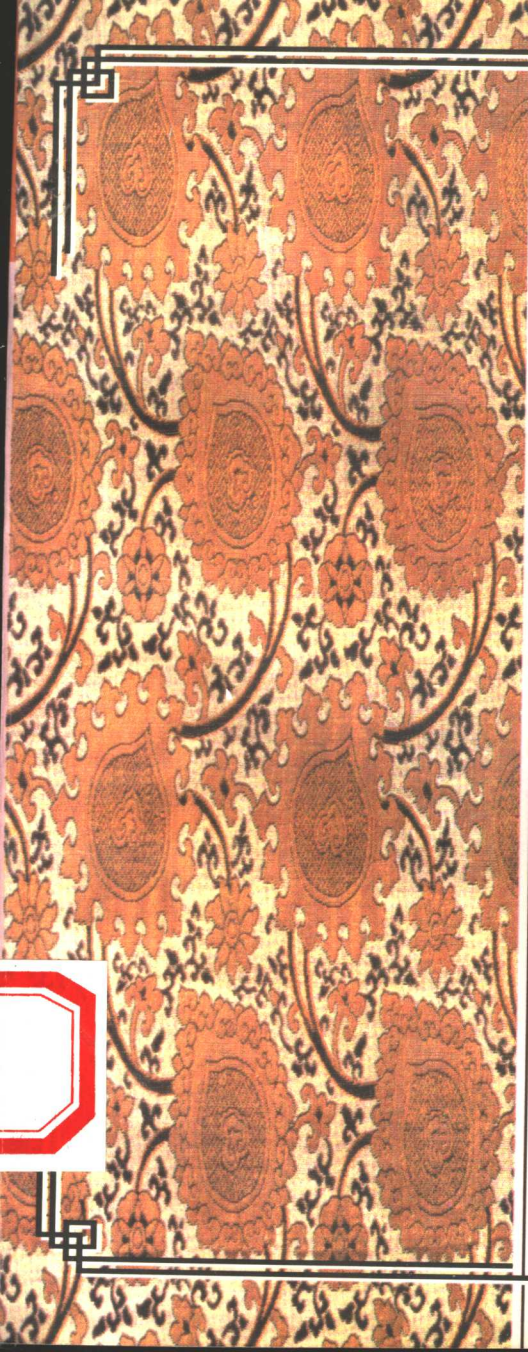


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

歐陽修散文選集

◆ 陳必祥 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

歐陽修
散文選集



◆ 陳必祥 編撰

上海古籍出版社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 聯合出版

責任編輯 倉陽卿

不

書 名 歐陽修散文選集
(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)

編 撰 陳必祥

聯合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
三聯書店(香港)有限公司

發 行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

印 刷 上海市印刷二廠印刷

開 本 787×1092 1/32 插頁2

字 數 278,000

版 次 1997年4月第1版
1997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 張 12.375

印 數 1—5,000

書 號 ISBN 7—5325—2241—5/I·1136

定 價 16.00元

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

編纂出版說明

中國古代散文，興于春秋戰國，歷經漢魏，踵事增華，至唐宋嬗變創新，豪擁以韓愈、柳宗元、歐陽修、曾鞏、王安石、蘇洵、蘇軾、蘇轍等八大家為傑出代表的作家羣，把散文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峰。八家的散文理論和創作，皆具獨詣，各樹豐碑，使散文藝術臻于極致，在中國文學史上鐫刻了光耀千秋、惠澤萬代的煌煌巨章。

這套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叢書，係從我社與香港三聯書店合作出版的《中國歷代散文作家選集》大型叢書中輯出。現將叢書編例說明如下：

一、《唐宋八大家散文選集》共七冊，內中蘇洵、蘇軾合為一冊，其他六家各為一冊。

二、諸家選集的人選篇目，力求體現該作家各時期的創作風貌。作品的編次，大抵以寫作時間先後為序，無法編年者置于最後。原文一般以近期出版較完善的點校本為據，槧本多而又無點校本者，擇善而從。各版本異文一般不注，關係到內容理解者則加以注明。

三、各集均有“前言”，介紹該作家生平、思想、創作歷程，着重分析其散文風格的形成與發展變化，提示其創作成就及在文學史上地位等。

四、古代的言文，向不一致。爲便于讀者理解和欣賞原作，對於入選的每篇作品，均作“題解”、“注釋”和語譯。

竭誠歡迎讀者對本叢書編纂工作批評指正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一九九七年五月

前言

一

歐陽修是北宋時期傑出的散文家，宋代散文革新運動的卓越領導者，唐宋八大家之一。

歐陽修，字永叔，祖籍廬陵（今江西吉安），宋真宗景德四年（公元1007年）六月二十一日生於綿州（今四川綿陽），四十歲時自號“醉翁”，六十歲後又自號“六一居士”，卒於宋神宗熙寧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閏六月。

歐陽修出生時，其父歐陽觀任綿州軍事推官。四歲時，父親去世，隨母遷往隨州（今湖北隨縣），投靠在那裏任推官的叔父歐陽曄。因家境清貧，買不起紙筆，母親就用蘆荻畫地教他識字，向鄰居借書讓他抄讀。十七歲那年，在隨州應舉，結果被黜落。

天聖八年（公元1030年），歐陽修二十三歲，在晏殊主持的禮部試中，名列第一，入於西京留守錢惟演幕府。此時，結識了蘇舜欽、穆修、梅堯臣、尹洙等一批才氣橫溢的詩人和早期古文家，同他們一起徜徉山水，寫作古文，名聲大振。景祐元年（公元1034年），到京師，由王曙推薦召試學士院，授宣德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鎮南節度掌書記、館閣校勘。時值西夏叛亂，加之連年水旱，官府財用匱乏，內外交困。明道二年（公元1033年），宋仁宗起用一批有革

新思想的人士。范仲淹被召回京師，任諫官。歐陽修寫了《上范司諫書》，給予他熱情鼓勵和殷切期望。不久，范仲淹言事忤宰相呂夷簡，遭到貶謫。身為諫官的高若納，非但不為其辯誣，反而投井下石。歐陽修激於義憤，寫了著名的《與高司諫書》，言詞激烈，因此獲罪，被貶為夷陵令。往貶所途中，撰《讀李翱文》，抒發因改革而遭受貶謫的沉痛心情，抨擊頑固派的因循守舊。到達夷陵後，又修《與尹師魯書》，表示為堅持正義，即使被殺頭，也在所不惜。為此，他特意將縣舍東廳題名為“至喜堂”，並作《夷陵至喜堂記》，表示身處逆境，仍應奮發有為。在此期間，他對古文革新仍十分關心。在《答樂秀才書》、《答吳充秀才書》等文中，反覆強調寫文章必須以道德學問為根基。在縣令任上，他翻閱了一些“陳年公案”，“見其枉直乖錯，不可勝數。以無為有，以枉為直，違法徇情，滅親害義，無所不有”（《容齋隨筆》卷四），遂得“周達民事，兼知宦情”（《與熊殿上書》）。這一時期，由於比較接近下層，擴大了閱歷，無論在古文寫作和文學理論上都有顯著的進展。誠如清人袁枚所論：“廬陵事業起夷陵，眼界原從閱歷增。”（《隨園詩話》）

康定元年（公元1040年）八月，歐陽修被召回京師，復充館閣校勘。此時，宋王朝與西夏戰爭連連失利，京東又醞釀起義，朝廷內外危機四起。慶曆三年（公元1040年），仁宗“廣開言路”，詔許百官封章言事。范仲淹出任參知政事。歐陽修被調任諫官，繼而又任知制誥。歐陽修在政治上積極主張改革，反對因循苟且，他參加了范仲淹的“新政”改革運動，並先後上《準詔言事上書》、《原弊》、《本論》等長篇論文，對宋王朝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教育等種種弊端

進行深入剖析，並一一指出改革措施。文章全面反映了作者的政治觀點和理想，與范仲淹等人的改革主張相為表裏。不久“新政”遭到朝中權貴的激烈反對，范仲淹、歐陽修、杜衍、韓琦、富弼等被指為“朋黨”。歐陽修又撰《朋黨論》呈仁宗，指出：“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，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”，而“小人無朋，惟君子則有之。”並列舉歷史上興亡治亂的事實以辨“朋黨”之真偽。慶曆五年（公元1045年），歐陽修甥女張氏因事下獄，歐被黨人誣陷，貶知滁州（今安徽滁縣）。慶曆八年（公元1048年）又調移揚州。兩年以後，又請准移調潁州（今安徽阜陽）。皇祐二年（公元1050年）升為禮部郎中，改知應天府，留守南京（今河南商丘）。長期的貶謫生活，使歐陽修身體一天天衰弱，眼疾常使他苦惱不堪，母親的病逝，更使他悲痛萬分。此時，歐陽修開始萌生激流勇退的消極思想，但並不甘於寂寞，仍希望有朝一日，“聖君”回轉心意，被重新起用，再展宏圖。

從康定元年到皇祐二年，這十年時間，是歐陽修散文創作的豐收和成熟時期。除了上面提到的論文以外，還寫了大量的遊記、書信、贈序、序跋和祭文。《醉翁亭記》、《豐樂亭記》、《菱溪石記》、《偃虹堤記》均作於滁州，《大明水記》、《真州東園記》作於南京。這些作品刻劃錦繡山河，抒發內心的抑鬱、感奮、追求和理想，成為久傳不衰的名篇。《送曾鞏秀才序》、《送楊真序》、《送徐無黨南歸序》等贈序文，以及為友人編輯詩文選集而作的《釋秘演詩集序》、《蘇氏文集序》、《梅聖俞詩集序》等序跋文，對時政，對人生，對友情，對古文革新等多方面都發表了精到的見解，充滿抒情性和哲理性。摯友尹洙、蘇舜欽、范仲淹的去世，是對歐陽修精神上的沉重打擊。《尹師魯墓誌銘》、

《祭尹師魯文》、《祭蘇子美文》、《祭資政範公文》等悼念文中，凝聚着作者悲痛和激憤之情，千百年來深深打動人心。

至和元年（公元1054年），歐陽修結束了十年的貶謫生活，帶着蕭蕭鬢髮來到京師，又被重新起用，官拜翰林侍讀學士、集賢殿修撰；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知禮部貢舉；第二年又接替包拯作開封府知州；嘉祐五年（公元1060年）拜樞密副使，參與軍機要務；第二年轉戶部侍郎，拜參知政事，又進封爲開國公，進階光祿大夫加上柱國。

歐陽修雖然身居高位，依然剛正敢言，“以是怨謗益衆”。他曾幾次上表辭官，或請調外任。治平四年（公元1067年），御史彭恩永、蔣之奇等人誣以“帷薄不修”、進行惡毒的人身攻擊。歐陽修爲此大怒，一月之內，九上奏札，申言“當舉族碎首號天叫冤，仰訴於闕廷”。新登基的神宗派人查核，證明純屬誣罔。蔣等被貶黜，歐陽修也辭去尚書左丞、參知政事等職，以觀文殿學士、刑部尚書出知亳州（今安徽亳縣）。隨後又任青州（今山東益都）、蔡州（今河南汝南）知州。仕途的艱難，使得他再展宏圖的願望又一次破滅，加之衆疾纏身，遠離官場、退隱江湖的思想也就越來越強烈了。

歐陽修晚年在創作上已很少寫有像早期和中期那種縱橫捭闔、言詞激烈的政論，而多似《有美堂記》、《相州畫錦堂記》、《岷山亭記》一類清淡典雅或帶有深刻人生哲理的小記，或是像《歸田錄》、《集古錄跋尾》這樣一些內容豐富，體制靈活的散文小品。嘉祐四年所寫的著名賦體散文《秋聲賦》則以高超的技巧，通過對秋聲的描繪和感慨，發揮了清心寡欲的老莊哲學，曲折地表達了作者在“慶曆新政”失敗後的苦悶消極和感慨。由於往日一起遊治、共同鬥

爭的朋友大多在窮困和貶謫中相繼去世，自己也已老態龍鍾。追昔撫今，越加憂傷和悲涼。這一切都在他晚年為亡友黃夢升、張子野、石介、蘇洵、梅堯臣等所寫的墓誌銘、祭文以及為緬懷自己父母而精心修訂的《瀧岡阡表》中得到深刻強烈的反映。

早在慶曆年間，歐陽修就開始寫作歷史著作《五代史記》（即《新五代史》），通過寫史來總結歷史經驗，並聯繫現實，引為借鑒。至和元年任史館修撰後，又和宋祁、梅堯臣編纂《新唐書》。未及終篇，梅堯臣病故，最後歐陽修和宋祁經過艱辛的工作，終於完成了這部史學巨著。

“十載榮華貪國寵，一生憂患損天真。潁人莫怪歸來晚，新向君前乞得身。”（《再至汝陰三絕》）歐陽修一再上表要求致仕，終於在熙寧四年（公元1071年）六月，獲准以觀文殿學士、太子少師的頭銜，退休潁州。早在皇祐元年（公元1049年）知潁時，作者就愛上了“綠水逶迤，芳草長堤”的潁州西湖（在今安徽阜陽城西北五里處），並在此買田修屋，為退隱作準備。在告老前夕，他仿效古代隱士，給自己取了一個新的別號——“六一居士”，並撰《六一居士傳》，記述自己的心境；又精心著作了一部帶有首創性的詩論集《六一詩話》；同時將自己的作品重新一一審閱訂正，由他的長子歐陽發編輯成《居士集》。歸潁以後的第二年，即熙寧五年（公元1072年）閏七月，歐陽修在潁州病卒，年六十六，諡“文忠”。

歐陽修是我國十一世紀的一位傑出的文壇領袖。他雖一度身居高位，但他的一生更多的是挫折和艱辛。他憂國憂民，幻想着國家的強大和太平，然而所見到的則是王朝的衰敗和百姓的貧困。他“少達而多窮”，而他的創作“愈窮則

愈工”。挫折、失敗、打擊、陷害，使他變得剛毅、清醒、深沉、冷峻。這一切溶入筆端，便使得他的作品內涵深廣，具有激動人心的藝術力量。

二

歐陽修學識淵博，在政治、軍事、史學、經學、金石考古和詩詞寫作等多方面都有研究和貢獻，然而最主要的成就在於他的散文創作；他以不屈不撓的頑強精神領導了宋代古文革新運動，終於使宋代散文創作出現了羣星燦爛、人材濟濟的繁榮景象。

北宋初年，由於社會較為安定，經濟比較繁榮，王朝統治者對貴族官僚採取籠絡懷柔政策，由他們徵歌逐舞，盡情享樂，讓他們賦詩作文，掩飾太平。於是曾經盛行於唐末五代的空泛奢靡的文風又得到迅速發展，最後終於導致西昆派的出現。

在散文方面，他們模仿唐時宮廷表章體裁的“四六駢文”，“專以聲病對偶爲工，剽剝故事，雕刻破碎。”（《神宗舊史·歐陽修傳》）這種文章極符合精神空虛的官僚士大夫的口味。由於統治者的提倡，“四六”文在宋初幾乎獨霸文壇，成爲人們獵取功名的敲門磚，故被人們稱作“時文”。宋初作家中，先有柳開、王禹偁、姚鉉、穆修等起來反對唐末五代以來的綺靡文風，以恢復韓、柳古文傳統爲己任；繼而又有孫復、尹洙、石介等人提倡古文，同一味堆砌詞藻、編排典故的西昆派作鬥爭，強調尊韓尊柳，恢復韓愈的“道統”和“文統”。但他們沒有全面繼承韓柳的古文優良傳統，在理論上比韓愈更有濃厚的道學氣，創作成就也不高，故未能移一代風氣。最後戰勝“時文”，並使古人創作

走向又一新的高峯的，是北宋時代以歐陽修爲首的一批古文革新家。

歐陽修在政治上力主革新。爲了把政治改革的主張和理想及時地加以推廣和傳播，就必須反對言之無物粉飾太平的“時文”，提倡內容充實，明白曉暢的文章，即所謂“古文”。鑒於這一目的，歐陽修對發動和倡導古文革新運動可謂不遺餘力，從多方面作出了重大貢獻。

歐陽修大力提倡以韓愈文爲寫作榜樣。在《記舊本韓文後》中，他闡述了三十年間學韓、尊韓的過程。他在兒童時代，從鄰居的破書篋中覓得久被淹沒的韓愈文集，深感其內容深厚廣博，筆力雄健奔放，但當時“天下學者楊（億）、劉（筠）之作，號爲時文，能者取科第，擅名聲，以夸榮當世，未嘗有道韓文者。”待到他考中進士以後，便同尹洙等“相與作爲古文”，最後終於使“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，而韓文遂行於世”。

在大力推崇韓文的同時，歐陽修又通過許多文論、詩話著作，提出了許多新穎獨到的文學革新的主張。

在“文”與“道”的關係上，他繼承了韓愈“文以載道”的理論，並且加以發展。韓愈的“道”是什麼呢？韓愈自己說過：“己之道，乃夫子、孟軻、揚雄所傳之道”（《重答張籍書》），亦即正統的孔孟學說。韓愈提倡古文、就是要用孔孟之道來充實文章的內容，以此來抵制和代替空洞無物的駢文。在這一點上歐陽修和韓愈是一致的，正如蘇軾所說，歐陽修“論大道似韓愈”（《居士集序》）。但歐陽修提倡的“道”又不完全等同於韓愈。他說：“知古明道，而後履之以身，施之于事，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，以信後世。”（《與張秀才第二書》）又說：“夫學者未始不爲道，而至

者鮮焉。非道之於人遠也，學者有所溺焉爾。”因為稍有成績，便自滿自足，甚至“終日不出軒序”，“棄百事不關心”，他認為這種人就不可能學到真正的“道”，寫起文章來，自然“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”。這裏他把立身行事，關心現實都當作學“道”的必要條件，可見他提倡的“道”已不單純是儒家教條，而更有崇尚實際、強調經世致用的特點。這就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韓愈把“道”僅僅局限於儒家教條的單純復興儒學的缺陷。歐陽修認為，為文的關鍵在於“道”的純正和充實，“道純則充於中者實，中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，施於世者果致。”（《答祖擇之書》）如果“道”不充實，一味追求技巧，則“愈力愈勤而愈不至。”（《答吳克修才書》）於是，他進一步得出結論：“大抵道勝者，文不難而自至也。”（同上）但他並不輕視“文”的作用。如他在《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》說：“某聞傳曰：‘言之無文，行而不遠。’君子之所學也，言以載事，而文以飾言，事信言文，乃能表見於後世。”他還主張，作家不僅要注意寫作技巧，還應該有自己的獨特風格。他說：“古人之學者非一家，其為道雖同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。孔子之繫《易》，周公之作《書》，奚斯之作《頌》，其辭皆不同，而各自以為經。”（《與樂秀才第一書》）這些主張，發揮了韓愈的“文以載道”的學說，避免了宋初柳開、石介等古文家忽視文章形式的偏向，對促進北宋古文運動起到了積極作用。

在作家和作品的關係上，他發展了韓愈“不平則鳴”說，提出了“窮而後工”的理論。他說，凡作者因不能施展自己的抱負，內心鬱結着憂思感憤，便興於怨刺，“以道騁臣寡婦之所嘆，而寫人情之難言，蓋愈窮則愈工。然則非詩

人之能窮人，殆窮者而後工也”（《梅聖俞詩集序》）。爲什麼“窮而後工”呢？因爲文學的生命在於真實，真實才能可信，才能感人。有抱負而處境困頓，容易比較真切地感受到社會的脈搏，其作品比較具有真實的生活內容和思想感情，能夠道出不平者的心聲。“窮而後工”的理論揭示了封建社會中文學創作的一個普遍規律。它可以勉勵那些困頓失意者不消極避世，而大膽寫出自己的憤慨與不平。

在語言形式上，他針對“時文”冗繁艱澀的弊病，提出了“簡易自然”的主張。但他所謂的“簡”不是苟簡、草率，而是“簡而有法”、“言簡而意深”（《論尹師魯墓志》）。所謂“易”，就是明白易懂，不故作高深。他認爲孔孟的學說，本來就“其道易知而可法，其言易明而可行”，而不像“時文”那樣，“以混蒙虛無爲道，洪荒廣略爲古”，以至弄得“其道難法，其言難行”（《與張秀才第二書》）。歐陽修特別強調爲文要曉暢樸實。據說他和宋祁共同編修《新唐書》時，歐對宋喜用怪僻古字不滿，但又不便直說，於是在門上寫了“宵寐匪禎，札闕鴻庥”八個古奧的字。宋祁看了問是什麼意思，歐陽修回答：“這裏用您撰寫《唐書》的方法，就是夜夢不祥，書門大吉的意思”。宋祁聽了大笑，知道這是在諷刺自己好用古字的毛病，從此勉力改正。所謂“自然”，就是不矯飾造作，不硬作文章，“須待自然之至”（《與澠池徐宰》）。他說：“孟、韓文雖高，不必似之也，取其自然耳。”（曾鞏《與王介甫第一書》）歐陽修提倡簡易自然，不僅是針對西昆派的虛靡浮華而言，也避免了韓文追求“奇”、“高”，以至走向艱澀怪僻的弊病。

歐陽修的散文理論是多方面的。如，他還強調要學

習和借鑒古今作家的經驗。“作詩須多誦古今人詩。不獨詩爾，其他文字皆然。”（《試筆》）又強調，寫作必須具有嚴肅認真的態度，應進行反覆的研究和多次的刪改以達到精工的目標等等。總之，歐陽修繼承和發展了唐代和宋初古文家的文論，並通過自己的創作實踐又有所發展，因而對指導宋代文學革新運動，促進古文創作的繁榮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。

歐陽修還利用他的身份和地位，為改進當時文風作了許多實際工作。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，他擔任禮部貢舉的主考官，梅堯臣作副手。那時的科場仍盛行“四六”時文，尤其京師國子監出身的舉子們，普遍追求“四六”文的新奇怪僻，因此人們把這種文體稱作“太學體”。歐陽修明確宣佈，本次考試的衡文標準，力斥險怪奇澀、空洞浮華的文章，提倡應試者要寫比較實用的散文。結果許多寫時文的權貴子弟被黜落，而具有革新思想，寫作古文的無名之輩被錄用。這次考試引起了因作“四六”文而被黜落的士子們及其支持者的極大不滿。一羣舉子在歐陽修上街時，竟“聚噪於馬首”（《四朝國史·歐陽修傳》）。但他毫不動搖，終於使考場的文風“從是遂變”（《四朝國史·歐陽修傳》）。科舉考試直接影響到全國士子們讀書作文的風氣。這次改革的成功，關鍵是利用了考官這一權威的力量。韓愈、柳宗元儘管也曾大聲疾呼寫作古文，却不能收到如此效果，這和他們的地位和影響不無關係。歐陽修為壯大寫作古文的陣容和力量，還熱心獎掖後進。如嘉祐貢舉時，歐陽修對青年學子蘇軾雄渾暢達的論文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特別讚賞，定為高等。後又讀到蘇軾的《上梅直講書》，激動地寫信給梅堯臣說：“讀軾書，不覺汗出。快哉，快哉！老夫當避路，放他

出一頭地也。可喜，可喜！”（《與梅聖俞》）所謂“避路”，就是不要因為自己的地位和影響而妨礙後進的發展。歐陽修在《贈王介甫詩》中稱讚王安石詩學李白，文學韓愈所取得的成就。當朝廷諫官出缺時，歐陽修便力舉王安石，說他“德行文學為衆所推，守道安貧，剛而不屈。”此外，歐陽修還薦曾鞏任館閣校勘，舉布衣蘇洵為文安縣主簿。曾鞏受歐陽修影響最大，後來也成為著名散文家，連文章風格也與歐文相近。由於歐陽修的熱誠努力，致使一大批後起之秀團結在他的周圍，上下呼應，相互揄揚，形成了一支比唐代韓、柳及其弟子聲勢、影響更大的革新散文的骨幹力量。

歐陽修對古文革新運動突出貢獻，除了以上幾點以外，另一個重要方面，就是他的創作實踐。他是文壇的主帥，散文作品數量之巨是驚人的，這豐碩的成果，再加上同輩和後進的大量古文，終於形成了北宋散文創作的繁榮局面，這是最後擊敗“西昆”時文，重新恢復古文統治地位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因素。

三

蘇軾說：“歐陽子，今之韓愈也。”（《六一居士集序》）但若把歐文與韓文加以比較，便會發現許多異同。正如袁枚所說：“歐公學韓文，而所作文全不似韓，此八家中所以獨樹一幟也。”（《隨園詩話》卷六）那麼不似之處在哪裏呢？也就是說，歐文的獨特風格是什麼呢？

關於歐文的風格和特點，歷代有不少論述。如王安石說歐文“豪健俊偉，怪巧瑰琦。其積於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。其發於外者，爛如日星之光輝。其清音幽韻，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。其雄辭閎辯，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”（《祭歐

陽文忠公文》)；蘇軾說他“論大道似韓愈，論事似陸贄，記事似司馬遷”(《六一居士集叙》)；蘇轍說他“天材有餘，豐約中度，雍容俯仰，不大聲色，而文理自勝。短章大論，施無不可”(《歐陽文忠公神道碑》)；韓琦說他“得之自然，不見痕跡”；李塗說“如瀾”(《文章精義》)；王十朋說“純粹”(《讀蘇文》)；明代茅坤說“迥麗逸宕”(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)；清代劉熙載說“幽情雅韻，得騷人之指趣爲多”(《藝概》)。這些評論，只是從某一方面論述了歐文的特點，却沒能從整體上，從與其他作家的比較上說出歐文的獨特之處。這裏不妨以韓愈的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和歐陽修的《送楊真序》作一比較。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是韓愈早期創作風格的代表作，蘇軾對此極言推崇：

“唐無文章，惟韓退之《送李愿歸盤谷序》一篇而已。”文中一段記載盤谷隱士李愿的大段獨白：

“人之稱大丈夫者，我知之矣。利澤施於人，名聲昭於時。坐於廟朝，進退百官，而佐天子出令。其在外，則樹旗旄，羅弓矢，武夫前呵，從者塞途，供給之人各執其物，夾道而疾馳。……窮居而野處，升高而望遠，坐茂樹以終日，濯清泉以自潔。採於山，美可茹；釣於水，鮮可食。起居無時，惟適之安。與其有譽於前，孰若無毀於其後；與其有樂於身，孰若無憂於其心。……伺候於公卿之門，奔走於形勢之途，足將進而趨，口將言而囁嚅，處穢污而不羞，觸刑關而誅戮。

僥倖於萬一，老死而後止者，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？”

這裏形容了三種人，一是做了大官，前呼後擁，享盡人間榮華富貴；一是不做官隱居山林，潔身自好；一是奔走權貴之門，熱衷功名利祿。文章鄙視當時聲威顯赫的官僚，讚美不